

默式博弈视角下美国对华战略探析

张一飞

摘要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不断加快，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在不断试探调整，双方新的战略默契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多地有意制造“默式博弈”情境，并利用此类博弈下的优势地位维护其既得利益。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默式博弈”原理的衍生战略，探究美国对华战略中在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强化有利于己方的明显标识，破坏与和平崛起国家的沟通渠道”这一基本思路，并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加速中国和平崛起为目的，提出“疏通中美沟通渠道，升级中美战略默契”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默式博弈 中美关系 战略默契

Abstract

As China accelerates its gradation to rise peacefully, the United States unremittingly adjusts its foreign strategy to China. The Sino-US new tacit understanding is coming into being. In this background, the United States seems to positively create more and more “silent game” situations to protect its achieved interests and its established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America’s “channel-destructing and symbol-strengthening” strategy in military,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toward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ne of the strategies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silent game”.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would be provided to China for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update of Sino-American tacit understanding to ensure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eaceful rise.

Key Words: Silent game Sino-America Relation Tacit understanding

一、背景引论：默式博弈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1) 默式博弈及其衍生战略

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托马斯谢林将“默式谈判”(tacit bargaining)定义为“谈判双方信息沟通不完全和无效情况下的谈判模式。”¹这一谈判背景被视为“默式博弈”的基本情形，即在无法实现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博弈双方或多方存在共同利益，其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如何分配利益整体，而是如何为实现共同利益寻求协调彼此行为的默契。如果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必须实现，在默式情形下，处于劣势一方对于自身相对收益的考虑则不再理性。

以谢林书中的主要案例为例，两名伞兵降落在同一村庄，双方没有通讯设备却都有该村地图，两个飞行员必须配合执行任务（“与对方碰面”为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若地图上最明显的标志为村庄中心的一座桥梁，则双方在无法联络到对方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不约而同前往桥梁处汇合。在此博弈中，“双方必须认同某种能够协调彼此对对方行为预期判断的暗示符号，”²双方所想的问题不是“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而是“如果我是他，且在想‘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

由此案例可以归纳出默式博弈的三大特征：第一，博弈双方拥有巨大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存在各自利益分歧（比如到桥梁的距离不同，以桥梁为默契汇合点，则距离远者付出的体力

¹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47页。

²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48页。

更多)；第二，博弈者的沟通完全失效；第三，博弈双方都可以发现的“明显标志”通常会成为双方默契的交合处。

在默式博弈背景下，共同利益之中存在的利益分歧源于博弈者对于相对收益的追求。例如，在伞兵博弈中，如果桥梁距离一方较近，距另一方较远，且双方都不愿多走路，则利益分歧出现，然而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汇合起来，执行任务），距离桥梁较远一方不得不选择向桥梁处（概率最大的默契汇合点）挺进，因为他既不能和对方面对面讨价还价，又不能放弃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依此逻辑反向推理，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方能够准确判断自己的优势，并对自己能够预见的结果充满信心，那么他就可以设法破坏沟通渠道或拒绝为相关问题提前与对方进行任何有效协商。”³在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之前，能够发出信息而不能接受信息无疑是巨大优势，因为对方在沟通失灵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屈从最大默契点（最明显标识）的所在方位支配。因此，这种面对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强化有利于自己的明显标识，同时破坏双方沟通渠道”的衍生战略可以作为默式条件下优势一方（明显标志作为默契点对其有利）的战略选择或对其战略意图的合理推测。

（2）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在现阶段，中美关系格局基本具备上述“默式博弈”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和平崛起使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据巴

³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53页。

黎银行（Paribas）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越美国，”⁴而根据高盛集团预测，“2027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⁵尽管中国崛起主要体现在互动型经济发展而非战术型军力扩张方面，但由于美国自身经历的狭隘性和特殊性，无法相信“强极不霸”国家的存在，“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扩展历来十分警觉。美国一直有丢失亚洲之忧，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随着中国崛起，这种担心呈几何级数上升。”⁶这使美国对华战略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越发明显，产生了从“接触加防范”向“制衡加合作”方向转化，且以硬实力制衡为主要变化趋势。因此，尽管中美关系基于核武器战略平衡、经济贸易相互依赖以及人文交流不断扩大的三大基石没有发生动摇，但美国对华战略的现实主义回流已经开始对中国造成外围压力。中美关系形成了既有合作共识又有经验分歧，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底线，既有时代责任又有传统风貌的复杂情境，高度符合默式博弈中“巨大共同利益之下存在各自利益分歧”的基本前提。而默式博弈“沟通失效”与“以明显标志为默契点”的另外两大特征，则可以作为美国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东亚强国制定新型战略的依据与方式。

二、 研究现状：默式博弈与美国对华战略

（1） 对于默式博弈的研究

⁴ Martin Jacques, *Understanding the China Phenomenon, Economy*, Nov. 26 th , 2011.

⁵ Sam Williford, *This Time American Decline Is Real, America's Economy Report*, January 4 th , 2011.

⁶ 王帆：《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20页。

随着西方博弈理论研究的传播与演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理论关注度有所上升，其现实应用研究潜力巨大。例如，有些学者对谢林的冲突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其中对于“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以及“自我控制理论”都有概括性论述，并评价非数理博弈理论“以博弈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自由地游弋于日常现象与深奥真理之间。”⁷但是这些研究通常以传统军备竞赛验证冲突理论的解释力，而在非传统安全因素重要性迅猛上升的背景下，以谢林的冲突理论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考虑新的时代特征与新的国际竞争方式。有些学者从默式博弈的角度分析核军备竞赛中的国家战略，认为国家战略反应的不明性与战略决心的明确性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保证，“所有国家应该让其敌国不断地去猜想其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同时，又要确保强有力的报复行为被看做是一个真正的选项。”⁸这些研究对于现实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整体而言，仍然没有逃出现实主义桎梏，在默式条件下，未来中国和平崛起对于国际战略文化的升级，可能并不止步于在现实主义逻辑下占据博弈优势。还有些学者意识到“临界点”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经过对于意识形态分歧与经济实力对比的分析，认为“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霸权国家愿意和平衰落。它总会利用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打击对手。”

⁷ 朱小梅，田贤亮：《托马斯·谢林非数理博弈理论评介》，《经济学动态》，2001年1月，第72页。

⁸ 刘安国：《托马斯·谢林对博弈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2期，第67页。

⁹但是，作者对于临界点的把握建立在对于不可调和立场的观察以及静态机械的经济数据对比之上，这不符合谢林对于“临界点”动态特征的描述，即“双方在博弈游戏中进行的各种互动具有符号意义，并能够为双方实现预期协同创造条件。”¹⁰其结论的预见性或有更大讨论空间。

（2） 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研究相对成熟，呈现出诸多研究视角。例如，有的研究强调了中美双方的战略认知差异，作者既察觉了美国使用“离岸平衡”战略排挤中国，也论证了“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中美关系许多难题的一把金钥匙。”¹¹有的研究从历史角度梳理了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最终认为“只有把中美关系建立在长期相互需要、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才能突破暂时的僵局而得到进一步改善。”¹²有的研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指出未来中美博弈中“中国战略西向，美国东西两线作战，大国安全博弈重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态势”¹³等特点。有的研究分析了美国对华战略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三种思路，从理论层面判断“中美关系虽仍会出现曲折和苦难，但可报基本良性互动和相对稳定发展的势头。”¹⁴还有的研究从政策实践层面判断“中美战略性冲突有可能

⁹ 任卫东：《在“临界点”上把握中美关系主动权》，《领导科学论坛》，2015年第16期，第17页。

¹⁰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97页。

¹¹ 何亚非：《中美战略相互认知与冷和平》，《领导文萃》，2015年9月，第121页。

¹² 王缉思：《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第29页。

¹³ 林宏宇：《中美博弈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第12页。

¹⁴ 张立平：《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48页。

上升，但同时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确的过程中，利益协调仍是关键。目前，中美战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间进入新的战略磨合期。”¹⁵

笔者希望在前人对于美国对华战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默式博弈的角度，探析中国崛起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可能且可以遵循的对华战略思路。

三、当代美国对华战略的默式博弈解析

如上文所述，默式博弈原理的逻辑倒推可以衍生出优势一方的具体战略，即面对巨大共同利益，一方面强化有利于自己的明显标识；另一方面设法破坏沟通渠道或拒绝为相关问题提前与对方进行任何有效协商，以此方式迫使对方为实现共同利益向明显标识靠近。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树立起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明显标识之后，极有可能考虑破坏或阻塞与新兴国家的沟通渠道，尤其是迫使其认为对自身霸权稳定造成威胁的新兴国家向美国国家利益基准靠拢。

（1） 美国的核心利益与其所涉领域明显标识的树立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2，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3，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普

¹⁵ 王帆：《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19页。

世价值”；4，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之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¹⁶在这四种利益所涉及的各自领域之中，美国都在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互动中树立起了强大的明显标识。

第一，在安全方面，美国以军事存在为明显标识，强调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名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其军事存在，试图使全球重点战略地区在安全层面对美国形成路径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几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曾达 5000 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目前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374 个，分布在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 30 万人；本土基地 871 个，其中海军基地 242 个，空军基地 384 个。美军目前控制的海上咽喉包括：阿拉斯加湾、朝鲜海峡、印尼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北端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古巴以北的佛罗里达海峡、从非洲南端到北美的航道、格陵兰-冰岛-英国航道。”¹⁷在美国的传统现实主义思路中，如此强大的军事存在即为全球传统安全领域的明显标识，使美国核心利益遍布全球，且暂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其军事实力形成有效挑战。美国有可能认为在沟通失效的情形中，地区新兴国家将被迫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向明显标识屈服靠拢，

¹⁶ 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68 页。

¹⁷ 达巍：《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国际资料信息》，2002 年第 6 期，第 6 页。

使美国得以保全在全球核心地区的“安全压仓石”地位。

第二，在经济方面，美国以体系开放为明显标识，强调美国的世界经济利益。二战之后，美国利用其美元的优势地位，主导建立起世界贸易组织（WTO）（截止 2011 年底，俄罗斯成为世贸组织第 153 位成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三大世界经济发展支柱。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因这场金融危机而根本改变。”¹⁸这使得世界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贸易体系都继续以对美开放为特征与趋势，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和领导开放世界经济体系的能力没有受到颠覆性挑战。美国也将继续强调体系开放的重要性，利用各种机会将其强化为绝对明显标识。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参与国必须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对外援助、救济与危机公关则普遍要求受援国改造自身经济结构，增加开放性与透明度。美国有可能认为在沟通失效的情形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被迫趋于成为开放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第三，在价值观方面，美国以民主观念为明显标识，强调美国的普世价值利益。美国普世价值的推广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911 事件”之后，其推广美式民主观念与政治制度的意愿更加强烈，奥巴马执政期内，宣称美国要“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观念与制度。但事实上，“美国推广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而是赋予了

¹⁸ 朱乃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趋势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 年第 1 期，第 31 页。

自己规定的内涵。例如，按美国的标准，政党制度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和领导人的普选制才算是民主，实际上，代议制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议制与民主划等号，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这是用具体取代一般。”¹⁹与此同时，“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广，把非本国文化看作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极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²⁰美国不仅把美式民主视为自身霸权正义性的依据，更将其视为别国政权合法性的标识。冷战中对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美国对外战略并没有真正摆脱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极有可能使美国误认为在沟通失效的情形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会以美式民主等同于执政合法性与改革准目标，并以此为标尺对自身进行“符合民意”的改造。

第四，在国际关系方面，美国以国际秩序为明显标识，强调美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尽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权力地位相对下降，但是，“事实上其他极并没有出现，因为美国的世界秩序仍完好无损。”²¹在一些美国学者眼中，由于国际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霸权的存在是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基本前提，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其绝对优势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但是，所谓“美利坚治下

¹⁹ 谢晓光：《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135页。

²⁰ 谢晓光：《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135页。

²¹ Robert Kagan,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Knopf, 2012, p.85.

的和平”更多地忽略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作用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为了和平与发展做出的个体努力。美国一方面利用二战之后世界整体稳定的客观形势为自己的“领导能力”邀功，另一方面在冷战思维下将新兴国家的崛起描述为对世界秩序与世界利益的挑战。出于对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稳定器作用的信心，以及对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中霸主地位的决心，美国有可能认为在沟通失效的情形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更倾向于奉行既定秩序，对于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革具有惰性。

（2） 关于美国破坏对华沟通渠道方式的合理推测

不论从基本体量还是从发展速度上看，中国都具备成长为全球性国家的潜力，这是美国不愿看到且必然采取战略措施限制的现象。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其第一次面对非西方文明国家从边缘国家成长为中心国家，同时也是其第一次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利用市场经济迅猛崛起。美国在做好迎接新的战略默契准备之前，有可能继续依赖其轻车熟路的冷战思维。在其树立起安全、经济、观念、政治等领域（美国观念中）的明显标识之后，为使中国向美国本国核心利益靠拢，美国有可能采取三种措施破坏与“挑战国”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三种措施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思路的方法论内容不谋而合。

第一，美国有可能试图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思路破坏中美沟通的心理基础。自 2010 年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其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越发明显，“经过近两年的酝酿，美国自

2011 年下半年开始以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的方式，使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到了具体的实施和推进阶段。”²²外交上，美国巩固和强化了与自己新老盟友的合作；军事上，如其所言，美国加强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经济上，美国不断推动一个绕过中国的泛亚太经济合作区的形成。这些举动符合新现实主义衍生出的制衡战略，美国以其在东亚存在的部分实力，联合中国周边部分国家迟滞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些举动最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制衡战略多大意义上收到了效果，而在于其政策中所蕴含的逻辑带有“双方必须考虑最坏情况”、“双方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对方的想法”、“双方都以自助为行为准则”等现实主义底色，当“双方必须考虑最坏情况”时，任何语言文字以及可变性政策的心理互信基础都将被破坏，美国对华政策中发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信号应为中美宏观战略互信不足负主要责任。

第二，美国有可能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思路破坏中美沟通的规则基础。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中，非西方国家的表达权、决策权、质疑权通常受到限制，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旧的国际机制不仅不能反应新的国际格局，更对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参与与表达造成了障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别提款权（SDR）为例，“30 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 SDR 分配总额的近 70%，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近 1/4，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 31%，由于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再也没有进行过 SDR 分配，

²²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讨论》，《当代亚太》，2015 年第 2 期，第 9 页。

这使得在此之后加入基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 SDR 发行所带来的好处。”²³中国在类似的国际机制环境下既无法充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也无力充分表达自身发展特点，而美国则一边继续迟滞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改革进程，一边指责中国在这些有限机制中缺乏透明度，拒绝融入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极有可能是其从规则层面破坏中美沟通渠道的行为。

第三，美国有可能试图以建构主义思路破坏中美沟通的环境基础。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行为体之间对彼此身份和利益的认知主要取决于第一次交往时的情境以及该情境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是否持续发生，由此建构而成的身份和利益将是行为体交往模式的依据和动机。秉承这一思路，在世界第一次看到非西方大国和平崛起之时，美国利用其话语权优势，试图将中国建构成为符合西方共有知识的“强极必霸”的“秩序挑战者”，而对于“崛起”的定语“和平”进行选择性的忽视，这给中美两国关系治理带来了新的难度。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带来的国际权力转移和平实现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和政策，”²⁴其在国际舆论方面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建构高度符合破坏中美沟通舆论基础的合理推测。

四、美国“默式”战略的中国应对

如果以上对于美国对华战略思路的合理推测属实，从默式博

²³ 黄梅波、熊爱宗：《特别提款权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环球金融》，2009年8月，第50页。

²⁴ 张骥：《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第44页。

弈的角度看，为维护国家利益乃至中美双边利益，中国的应对措施可以从至少两方面入手。

（1） 疏通中美沟通渠道

在现实条件下，对于中美沟通渠道的所谓“疏通”也可以理解为“修复”。如果说美国依据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思路分别从心理、规则和舆论三方面分别破坏沟通，则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则可以被视作分别从这三方面恢复中美沟通渠道的努力。

首先，“不冲突不对抗”针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下实力制衡与反制衡的斗争性思路，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心理安全渠道。在人类历史上的冲突和对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争层次、冷战层次和非正常竞争层次。美国经久不衰的冷战思维对中国的战略定力是一个极大考验，也是世界和平的重大隐患，美国试图通过非正常竞争层次的冲突将中美关系拖回到冷战甚至战争层次的冲突和对抗，而中国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是对“中美关系底线为何”的正面回答。中美两国战略安全的压仓石主要集中在核武器制衡、经贸量级、深度人文社会交往三个方面。中国提倡的“不冲突不对抗”不是委曲求全，不是没有底线，更不是他国得寸进尺的依据，而是在这三个压仓石已经存在的基础上防止中美关系沿着冷战思维倒退，符合人类进步总趋势的倡导。确保安全的战略底线是中美关系一切可能性的基本前提。

其次，“相互尊重”针对新自由主义下制度霸权与反霸权的

斗争性思路，为中美关系提供了规则安全渠道。自二战之后美国几乎主导所有国际机制并利用其优势话语权对其认知中威胁自身霸权的国家进行试探、遏制和塑造。国际机制体系的搭建既是美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也使美国维持其霸权稳定的工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倡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其本质正是建立起包容差异，优势互补，通力同心，便利协作的规则体系，而这一目标的根本原则就是“相互尊重”，在中美之间实现“相互尊重”更是最为关键的题中之意，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更是新型世界关系的试验田与护航舰。

最后，“合作共赢”针对建构主义下话语塑造与反塑造的斗争性思路，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环境安全渠道，也是中长期利益安全渠道。如果说“不冲突不对抗”是起点，“相互尊重”是过程，“合作共赢”则是目标，也是被历史证明的处理大国关系的最明智之举。“如果美国被引导到对抗中国权力的错误因素上，或者美国采取广泛和无效率的对抗性制衡措施，即使美国向国防开支中投入更多金钱，或者提升纵横军事实力，也并不一定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²⁵使大国关系趋于稳定与安全的不仅仅是客观上的相互依赖，更重要的是双方主观意愿的相互建构。目前，中国希望与美国在各自的实力层次上共同努力，在各自的实力领域中合作互助，抛开现实主义思路，实现大国之间的共赢与国际范围内的安全繁荣，但美国似乎仍在持续以默式博弈的衍生战略任由两

²⁵ 王辑思（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期，第85页。

国关系向消极方向滑动。

总之，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利益、规则、关系方面都围绕一个“和”字展开，而只有“和”字有可能修复被美国以“斗”字为中心的对华战略破坏的沟通渠道，使两国关系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美国对于中国恢复沟通渠道的回应方式与接受程度既取决于中国恢复各方面沟通渠道的过程中美国核心国家利益是否受损，也取决于中国模式会否被其他国家复制。而中国在做出“合作共赢”的承诺之后，首先克制了自己的大国战略选择，明确中国不追求霸权国地位，主动伸出橄榄枝，愿与美国共同升级整体利益而非争夺平面零和利益。尽管在冷战思维中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可靠，但是，在中国“强而不霸”成为既成事实，且其他国家不能复制中国经验对美国造成新的挑战的前提下，美国逐渐摆脱冷战思维，中美重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不试图把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东亚甚至取代美国而代之，而美国也应在价值观外交、和平演变外交等中国无法接受的方式中做出妥协，单方面的诚意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制度和形成更加和谐的文化。

（2） 升级中美战略默契

尽管“对于中美战略博弈这样的巨型非线性动态系统来说，新的稳定模式不是任何单方面能够决定的，而是双方互动的产物，是一种不为系统的任何部分（不论这个部分何等强大）所左右的

整体涌现性，”²⁶但是谢林的冲突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观点之一即为“通过改变对方对于自己的预期而影响对方决策”，而要减少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存在负面预期这一既成事实，在行动层面，中国在中美两国宏观战略默契的升级过程中，应该做到有经有权：

第一，稳定“霍布斯式默契”。所谓“霍布斯式默契”是指中美双方控制自身的底线思维，不使最坏情况发生。在现实主义的强制理性思维下，中美两国的现实主义内核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这是两国的战略起点，却未必是战略终点。在这一起点上，中美两国核心传统安全利益的交叉点即为“霍布斯式默契”的保证。北纬 38 度线、台湾海峡、南海既成格局、中美战力（并非军力）等明显标识即为双方默契交汇点。尽管美国时常通过一系列方式试探新的中美默契底线，如支持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派出军舰进入南海南部等，但并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安全标识的基本格局，中国自身的和平崛起大战略也需要将中美“霍布斯式的默契”继续稳定。中美是两个足以影响世界的巨人，即使在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中，维持目前的世界权力格局也是双方共同追求的大于一切的共同利益。

第二，调整“洛克式默契”。所谓“洛克式默契”是指中美双方在各自维持战略底线不被打破的基础上开展建设竞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不对既成平面格局主动挑战的前提下，可

²⁶ 苗东升：《维护中美战略博弈的纳什均衡》，《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3卷第3期，第25页。

以“竖向”升级各类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在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等新兴国际机制不断涌现、互动的背景下，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脚点符合历史趋势，在二维空间的平面利益中的零和争夺需要转向三维空间的立体格局中的合作，而牵引霍布斯式的强制理性转向洛克式的合作理性可能是历史赋予中国这一具有“和合”传统的新型大国的使命与责任。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哲学，中国的和平哲学中对多样性差异的包容性更强，对关系治理的经验更加丰富，是值得美国借鉴的全球治理哲学。

第三，引领“康德式默契”。所谓“康德式默契”是指中美通过竞争与合作的长期互动形成的利益高度一致，以彼此之得失为得失的理想状态。在霍布斯式默契基本稳定，洛克式默契不断涌现新质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作为在安全合作、经贸发展、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都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的责任实体，存在由“合作”（互相让步妥协保证双方福祉）向“和谐”（任何行为自动促进对方福祉的增长）的可能性。从建构主义角度而言，美国“领导世界”的形象已在过去的六十年中被建构成型，而中国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一次作为世界焦点大国重新出现，由中国领衔推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文化由“损人即利己”、“救人即救己”向“人即为己”过渡，可以帮助中国树立真正属于自己国际威信，这也符合中国“以德服人”的内在行为规范与心理需求。康德描述的和谐世界与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尚有

区别，但整体方向上都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洛克式默契”之中，美国对华战略的现实主义回流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战略压力，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提供了向世界展示自身“和谐世界推手”这一形象的机会。

五、 结语：

笔者认为当代美国对华战略的各个层次都符合默式博弈原理下“强化存在，破坏渠道”的衍生战略设计，因此该战略可以作为美国对华战略基本思路的合理推测。如果美国在安全、经济、价值观、政治等方面持续强化明显标识，而同时以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部分理念的方法论手段破坏中美沟通渠道，则中国更应从全人类整体利益角度出发，不被冷战思维冲昏头脑，不被美国的战略压制吓阻，以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为恢复中美沟通渠道作出努力，并通过稳定、调整、引领不同的默契水准，升级中美战略默契。

从默式博弈的角度说，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三点：第一，美国是否要继续强化其战略中的明显标识。不少学者对于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心本质上是担忧美国过分强调领导权与战略底线的保守战略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意愿往往伴随能力形成而生，当美国对自身实力与战略准备的评估突破一定量级，其战略目标很可能由“保住底线”转为“逆我者死”，逼迫他国得不得予以还击，引发新一轮国际权力格局

动荡。第二，美国是否要继续破坏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如果美国继续输出并强化“中国意图不可知”，“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崛起威胁世界”等带有明显误导性与塑造性的信息，在心理、规则与环境三个方面迫使中国在不改变和平举起这一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不得不做最坏打算，专注提升自身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A2AD），这对于两国战略默契的维护和战略信任的提升极为不利。第三，中美新型大国关是否可以落地为双方战略互动中的具体机制与各自对外政策。中美在非传统安全、技术创新、贸易扩展、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尤其是中美海洋合作与网络合作，目前仍没有成熟方案形成，在如此广泛的合作上升空间中，融入新型大国关系思想尤为即时与可行。从危机管理型机制，到功能溢出型机制，再到利益共同体运行机制，是大国合作机制建设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中美战略互动仍处于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阶段，下一阶段的健康方向是通过领域合作营造积极环境、建立相互信任并扩大合作范围的功能性机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一，中文：

- 1, [美]托马斯.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2, 王帆：《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外交评论》，2010 年第 6 期。
- 3, 朱小梅，田贤亮：《托马斯. 谢林非数理博弈理论评介》，《经济学动态》，2001 年 1 月。
- 4, 刘安国：《托马斯.谢林对博弈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5 年第 12 期
- 5, 任卫东：《在“临界点”上把握中美关系主动权》，《领导科学论坛》，2015 年第 16 期。
- 6, 何亚非：《中美战略相互认知与冷和平》，《领导文萃》，2015 年 9 月。
- 7, 王缉思：《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美国研究》，1992 年第 2 期。
- 8, 林宏宇：《中美博弈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2 期。
- 9, 张立平：《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
- 10, 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
- 11, 达巍：《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国际资料信息》，2002 年第 6 期。

- 12, 朱乃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趋势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1期。
- 13, 谢晓光:《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 14,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讨论》,《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
- 15, 黄梅波、熊爱宗:《特别提款权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环球金融》,2009年8月。
- 16, 张骥:《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 17, 王辑思(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期。
- 18, 苗东升:《维护中美战略博弈的纳什均衡》,《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3卷第3期。

二, 英文:

- 1, Martin Jacques, *Understanding the China Phenomenon, Economy*, Nov. 26th, 2011.
- 2, Sam Williford, *This Time American Decline Is Real, America's Economy Report*, January 4th, 2011.
- 3, Robert Kagan,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Knopf, 2012.